

《苍生》与“八十年代浩然”

邵 部

【作者简介】邵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9.10.7~15

《苍生》被浩然视为“从1976年到1986年这个阶段艺术实践的一次小结”^①,是他在八十年代的代表作。这部小说首先发表于《长篇小说》1987年第13期上,单行本发行于1988年,版面字数43万字,通过冀东田家庄一户普通农民的婚嫁故事,勾连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寄寓了浩然对于人民公社结束这一时期农村现实的思考。此前创作的断裂和延续在《苍生》里都可以找到清晰的痕迹,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旧我”是如何被转换到新的历史情境中继续生长。可以说,没有《苍生》的浩然是不完整的。

然而,作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浩然一直被同定在《艳阳天》《金光大道》、“文革文学”几个标签上。他在八十年代之后的争议和新作,或是预先被限定了讨论的问题域,或是因此被遮蔽,都无法撼动文学史的定格效应。《苍生》保守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于集体化和农村改革暧昧不清的情感态度,决定了浩然借此东山再起的雄心只能是一次无望的挣扎。出版后虽引起一定反响,但终究还是难逃让时间吞噬的命运。到了今天,它几乎已经被学界遗忘。^②笔者以为,无论是对于理解浩然还是对于理解农村改革而言,《苍生》都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浩然如何反映那场奠定了今天农村现实的改革?作为一位完整地跨越了前后三十年的特殊作家,他的写作与八十年代文学有怎样的联系?当我们开始反思乡土改革小说的政治性,对它们感到不

满足时,《苍生》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回望这段历史的视点?以这些问题为导向,《苍生》的阐释空间就有了被打开的可能。

一、浩然的困惑

《苍生》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开篇:

在八十年代刚刚开头的那个热热闹闹的日子里,偏僻的山村有一群奇而不奇的人,做出一连串怪而不怪的事情,让不摸头脑和根底的旁观者,看起来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对他们的处世态度和所作所为,不知道应该同情呢,还是应该鄙视?应该赞成呢,还是应该反对?实在是个让人困惑难解的问题。

扑面而来的是一位“困惑”的叙述者,这种情况在浩然的创作中很罕见。联想到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的开头:“清早,飞来了两只花喜鹊,登在院子当中的桃树枝上,冲着北屋窗户喳喳地叫。”或是《金光大道》从历史转入现实时的叙述:“新生的芳草地,刚刚欢度了国庆一周年,又祝贺土改大胜利,真是喜上加喜!”不难发现,面对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浩然的情感方式已然发生了某种变化。

考察这种变化,首先要留意浩然写作《苍生》时的历史情境。1978年的重评使这位一度被树立为文学样板的作家,变成了新生活的追赶者。无疑,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少年时代的惨痛经历(早年父母离世,与姐姐寄居在舅舅家里,险些被侵吞家产)与新生政权对浩然的再造(成家立业以及成长为作家),使

浩然创作在潜意识层面上带有一种“报恩思想”^③，真诚地接受和歌颂集体化，愿做党的政策的虔诚信徒。另一方面，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浩然的文学成就与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实践步调一致，这段历史进程已经通过写作内化为浩然的人格表现。于是，与“前三十年”的特殊联系让他与新生活的融合有着比同代人和新锐作家更高的难度。

他未尝没有为此做出过努力，反思历史教训的《山水情》《浮云》，表现新事物新气象的诸多中短篇小说，即是融入改革意识形态的尝试。只不过，一边是浩然“缩小目标，埋头苦写”，一边是“文艺评论界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谁也不知道我写了一堆作品”^④。即使这些作品通过三卷本《浩然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集中亮相，他“展览一下新成就就会别有一种特殊影响”的期望终究落空。似乎不论怎样创作，浩然都无法重塑自己在文坛上的形象。这种境况使他一度产生避开现实题材，写作自传体小说的念头：“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时代，写改革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责任；我的时代已然过去，所剩下的只有回忆了。”^⑤因此，他才会会在写作《苍生》间隙，发出感慨：“我的东西，就是达到万吨炸药的劲头，也是打不响的。”^⑥

“过去”在浩然这里与同时期作家的意义并不一样。他为“过去”所累，因此在新时期文坛中展现出别样的创作姿态。那些可以轻易被其他作家告别的理念，浩然处理起来就要审慎得多。他在清理旧我的同时，也从中转化出了面对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尤其是经过作家痛苦的蜕变之后，这些保留下来的观念变得更加坚定：农村的集体化道路以及高大泉式的理想形象。它们构成了浩然认识改革和阅读新时期文学的前理解。

带着这种眼光看农村改革，浩然不免“对许多事物不理解而感到是非难辨、好坏难分，由此陷入困惑”^⑦，反映出浩然观念上的矛盾之处。如雷达所论：

“一大部《苍生》，本身就留下了作家自搏的斑斑痕迹。”他在《苍生》中重新丈量自己走过的路，以“倒影”的方式唤回曾经的萧长春、马之悦、焦振茂、马连福、焦淑红、马小辫等，“在原先肯定的地方换上了否定或怀疑的评价”^⑧。以至于使论者得出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观照现实的确定支点”的结论^⑨。

同时，他又因此对八十年代反映农村改革的文学作品感到不满，带着明确的所指数性进入《苍生》的写作。被主流文学边缘化，倒逼着浩然去了解当时的文学现场正在发生什么。胡世宗1985年10月13日的日记记载了与浩然去医院看望友人王栋的事情。他们注意到王栋枕边放着一本《红岩》，看得很仔细，还批写着诸如“这里有伏笔”之类的话。浩然的态度有些令人意外，劝王栋不要看这些东西，要看看全国获奖的中篇，新人写的，浏览一下益处会更大些。^⑩有了阅读，自然就会涉及评价。在既有的阐释框架内，浩然被塑造成以生活见长，而少于见识，弱于理性的作家。笔者在以《浩然作品研究资料》《浩然研究专集》为中心，相对集中阅读了公开发表的序跋、创作谈、演讲后，也一度认同浩然是用直白的政策条文，代替作家应有的独立思考。但是随着浩然通信等私密性史料的浮出，浩然对新时期文学作品和现象的评价可以勾勒出一条相对明晰的线索，这种普遍性的作家印象也就有了适度调整和纠偏的必要。至少是对于本文讨论的八十年代浩然而言。

浩然如何阅读和接受新时期文学？我们可以在此枚举几则例子展开这个反向的评价史研究。1976年1月，浩然与胡世宗分享创作经验，谈到写作要集中别人的精华，创造自己的风格。他说他喜爱的是孙犁的优美、抒情，柳青的深沉和赵树理的故事性。^⑪1978年11月1日，浩然在给女儿梁春水的信中如此评价《伤痕》：“我个人觉得，这类作品可以允许存在，但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主流。不论从哪方面讲，这篇作品都极一般；目前的‘轰动’，乃是暂

时的政治需要。你要有保留地看它。”对于蒋子龙，相较于《乔厂长上任记》这篇改革文学经典，他更偏爱《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理由是蒋子龙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独有的形象，意义深刻的形象。^⑩至于同代作家，浩然则认为“从维熙还要在目前水平上停留很长一段时间。王蒙复出后没写什么重要作品，不如他当‘右派’之前的作品有活力。陈建功应当能写出来，可是当官了。邓友梅很难再进步……”^⑪这些论断不同于当时批评界的主流声音，而与逐渐沉淀下来的文学史结论较近。或许是因为，浩然与阅读对象之间，即使同在历史现场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段距离使他足以抵抗新时期文学的情感动员，用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观察和思考，使他与时代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对话关系而非共鸣关系。反映到《苍生》上来，就表现为浩然因有悖于时代主潮而产生的“小心翼翼”的心理：

那时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许多作品写到农民富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花了，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农村富得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写《苍生》，同志们可以想象我这种小心翼翼。我不是说富的没有，坐飞机旅行的没有，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的没有，但是更多的农民没到这个程度。^⑫

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是“陈奂生系列”里的经典情节。我们通常的读法是将其放在国民性话语的脉络里进行分析，浩然的关注点却在一个“富”字，在于农村的物质生活是否已经达到了支撑这种文学想象的程度。归根结底，他关心的还是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问题。既然八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与浩然对社会生活的个人认知之间存在着错位，那么改革中的农村现实在浩然的眼中是什么情形呢？

二、改革年代的“问题小说”

田家庄的经济改革是由上而下，一夜之间完成的。党支书邱志国曾经是萧长春、高大泉式的人物，

带头在田家庄办起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人民公社时期始终是先进和典型。承包制开始流行时，田保根和村子里的几个青年人草拟了一份承包大队果园的申请报告，被他当成是复辟资本主义、倒退单干。邱志国暗下决心，只能前进不能倒退，保住集体化的成果。为此，公社领导三天三夜连番谈话，用熬鹰的办法做他的思想工作。从公社回来后，邱志国产生了“翻个儿”式的转变，立即彻底推行“生产责任制”。田家庄的集体资产，包括土地、果园、砖瓦窑、鱼塘，一点也不剩地承包到个人。

这是农村改革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小岗村十八户村民的“生死契约”，为分田到户的行为添加了英雄主义的悲壮色彩和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然而，《苍生》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被改革”的社员们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目瞪口呆。大队长郭云惊诧地大叫，老烈属“哇哇”地痛哭。社员们当晚回家嘀咕了一夜，第二天都变成了猛虎：“每一家户主都率领着家小，跑到饲养场抢好牲口，跑到村外占好地块儿；一台手扶拖拉机两个生产小队抢，没办法就大卸八块，几个人各分一些零件；有几个家里没有‘能人’的社员户，见别人分到东西急了眼，弄不到别的值钱的东西，就拆大队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⑬

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平凡的世界》里。双水村一队孙少安的设计下实行承包到组的方案，改革平稳推进，立显成效。二队因为支书田福堂对改革抱有抵抗情绪，放任他们“彻底革命”，于是把承包责任制弄得像土改时的分浮财一样，完全失去了章法。土地和牲口按照抓纸蛋的结果分配，村民不满就吵架、动手。公物绝对平均，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剃成几段麻绳头，一人拿走一段。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据

说拖拉机上的钢好,罢了拿到石圪节或米家镇打造成老镢头……^⑥

浩然于1984年5月写出《苍生》草稿,1985年12月重写,1986年4月修改定稿。《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准备于1982-1985年,第一稿完成于1986年冬,定稿于1987年夏。写作时间大致重合,且二人并无生活上的交集。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触及这一场景,可能的解释只能说是他们在各自的环境中,遇到了类似的素材。问题是,当他们把这些素材组织到小说中时,他们便显示出与大多数改革作家在观念上的不同之处。对比《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来看,何士光展现的是一个破了产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冯么爸,因为国家政策的落实,而硬起腰杆顶撞支书。他设置了一个“二次解放”的故事,歌颂农民在改革中获得的主体性地位,于是有了如下的翻身道情:“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正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浩然与路遥则通过改革起源时刻的场景,看到了去集体化之后,小农经济的自私性和自发性的隐忧。

浩然是集体化时代的过来人,自然了解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的抑制。在他笔下,人民公社制度在七十年代的田家庄几乎已经难以为继。“‘集体’这个神圣的字眼儿,已经在心里淡薄了”,社员们对生产抱着“对付对付”的心态,集体怠工。即便如此,邻村都没能夺走“那面红缎子面、镶着白边儿、挂绿穗子、贴着金黄金黄大字的流动奖旗”。^⑦这段历史是他本人“以热情、积极、虔诚的心态参与‘制造’的历史”,“对这样的历史上的某些阶段的实践和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加以否定”,触动着他的灵魂。“认识到农村必须实行改革”被浩然视为自己重新认识历史的重要思想收获。^⑧

然而,作为限定词的“某些”也暗示了浩然对集体化时代复杂的立场。他不能完全接受主流的抛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⑨的人民公社体制,把经营权

完全下放到家庭一级的改革方案。基于动员和组织个体农民的考量,浩然以集体化的优越之处为参照观察改革,暴露其中隐藏的问题。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讲,《苍生》就变成了改革时代的“问题小说”。

首先,基础建设停止,搞了多年的灌溉设施遭到破坏。农村处于无组织的状态,老队长无法调集人手,只有几位留恋过去的老人——老烈属、水利局退休的老科长、老队长郭云,自发地撬动挪位的水泥管子做些修补工作。

其次,弱势群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孤寡老人何三老头“瘦弱无力、使人怜悯”,住在“既脏乱,又充满凄凉气氛的屋子”,席片露着炕坯,摆着脸盆、瓦罐、木筒接雨水,旁边放着一只很大的破笆篓筐子,预备房屋倒塌时保命。老郭云央求电工帮忙修缮房屋,遭到无情拒绝:“现在讲经济效益,讲实惠,出点力气谁给钱?”对比来看,浩然1972年的短篇小说《一担水》处理的也是“农业社对孤寡老人的照顾问题”。他以自己下乡时的见闻为素材,写了一个社员马长新数十年如一日为孤寡老人挑水的故事。“挑水”只是一个细节,但它象征性地解决了以上这个大问题。

再然后是基层干部的权力变质。田福堂之所以抵触改革,隐秘原因在于他的个人利益会受到损害——“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爱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⑩他提出了一个“集体散伙之后田福堂怎么办?”的问题。对此,浩然做出了不一样的回答:“支书的权力果真比‘大拨轰’那会儿小了吗?谁要说‘小’了,他准是个算卦先生那样的人,坐在屋子里编的!想一想吧,村里的电工归支书管不?水渠看闸门的听支书的指挥不?上边来的放贷款、卖化肥、收税钱的那些端饭碗的人,来到村子里依靠谁?谁陪着吃吃喝喝?谁能帮他们闹点儿土产和别的‘好处’?他们相信谁的话……”^⑪算下来,支

书的权力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可以兑换成直接的利益。邱志国入了砖瓦窑的权力股,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分红。欲望再大一点,就演变成了套取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

归纳起来,根源在于浩然追问曾经的“人民”,现在的“苍生”是否在改革中受益。他之所以认定田家庄的改革并不成功,是因为他看到受益者是手握权力的邱志国,是承包了砖瓦窑和果园的专业户,以及在这个利益链条下游,得以进入工商业生产分得一杯羹的农民。他们是少数富裕起来的人。而对于像田成业这种“跟大帮、随大流的芸芸众生”,成家立业的传统理想依然显得那么遥远。浩然无法接受贫富差距的分化,因而在《苍生》中反复渲染这一点:邱志国两三年间即为三个儿子兴起四座宅院。家里凡是懂事儿的人,包括认不准时间的老伴,胳膊腕子没有不戴手表的。田成业一家耗尽财产才勉强盖起了房子。老实本分的留根因为一块手表,差点走上偷窃的道路……

九十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大多被放置在离土叙事、颓败叙事或是望乡写作的范畴里。将其与改革初期的乡土文学对读,不难发现这两种乡村叙事之间,已经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断裂。这个断裂既是美学的,更是历史的,但是很难在1985年之后的主流文学中找到解释它的路径。反而是浩然的《苍生》与路遥的《平凡世界》这类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进入这条断裂地带的文学史线索。

三、苍生的困境和出路

田家是被浩然从“苍生”中拎出来的典型。大龄青年田留根一直说不上媳妇,并不是因为田家的人品和名声不好,而是他们盖不起房子。改革伊始批下的宅基地,三年过去了还只是垒起个底盘。田家造屋的方式颇为原始,指望田成业与大儿子人工开采山石,手凿肩扛准备原料。房子勉强落成,前面还有彩礼的难关。也就是说,表面上看,陷田家于困境的是传统乡土伦理中的婚嫁问题,归根结底却是一

个改革时代的经济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在高晓声笔下自然而然发生的造屋故事,到了浩然这里变得如此艰难?这就需要读者跟着浩然一起算一算田家的经济账了。土地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最核心的问题。邱志国的改革方案是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田家庄人多地少,摊在每个人身上,不到二亩。因为老田家有两个待娶的男丁,适当照顾,在此标准的基础上,搭配了一条山坡上的石头子儿地,总共得到了将近十亩地。老二保根曾提议在家庭内搞副业增收,但被惧怕经济风险的田大妈一票否决了。于是,这将近十亩地就构成了田家的全部收入来源。

田成业认为“包的那几亩地,绝不会变出房子变出媳妇来”。为了说明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他与老伴做了一次经济学推演:

你想想,这一年四季里,买化肥,购农药,花机耕钱,交水电费,再除去承包款和公粮,还有杂七杂八的用项;这么里外一扒皮,土坷垃里再往高增产量,又能够剩余下多少?四张嘴还得填,一群鸡、两口猪还得喂吧?^②

改革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一度激发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短时间内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但分田到户之后,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发生变化,反而会因为零碎土地的个体经营,带来诸如机械化受阻之类的局限。随着农业生产进入常态,个体经营体制下生产力上限逐渐明晰。田成业的经济账就是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以减法为逻辑基础,算足收益、扣除成本即所得。这种算法与《黑娃照相》(《上海文学》1981年第7期)中的那套著名的加法公式正好相反。专研过一点“经济学”的黑娃之所以对未来充满希望,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上:

一两特级兔毛,明码实价两块七。一只长毛兔一次能剪一两毛,一年能剪五次,算算,四只长毛兔一年能剪出多少“两块七”?“特别的尤其是”——黑娃强调指出,母兔长到三个月就要当娘了,一个月能

生一窝兔娃，一窝少说七八只，一年之中，兔娃生兔娃，兔娃的兔娃再生兔娃，找个电子器算算，一年能生养多少兔娃呢？兔娃满月半斤重，一只只能卖一块钱，再算算，这笔收入是多少？“更加的尤其是”——黑娃进一步强调指出，长毛兔爱吃百样草，不吃粮食，冬天没青草，就吃蜀黍秆、红薯秧子。喂鸡还得舍把米，喂这长毛兔舍点啥？四两力气。

不难看出，黑娃设想的是一种没有成本的收益，没有极限的增长。相比之下，田成业则要务实得多。浩然素来被指认为“图解政策”的作家，即为了响应一时的政策，不惜在作品中歪曲农村现实。也就是说，当“为政策”还是“为人民”发生矛盾时，浩然往往牺牲后者选择前者。对于八十年代的浩然来讲，这个判断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从这两本经济账可以看出，恰恰是浩然站在改革中普通农民的角度看问题，而改革作家的写作“为政策”的味道要更浓一点。

田成业的经济账揭示的是田家庄改革中多数人的普遍遭遇。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则有另外一套算法。集体开山辟地，搞了近三十年的果园以三千元的价格承包给翻身地主巴福来，“苍生”对这笔经济账了如指掌，“没浇水，没施肥，没除草，只打了两回药水，花了点看守的功夫，纯利润就是七八千块大洋”。砖瓦窑的收益则牵涉到一笔他们看不到的黑账。借县外贸办盖冷库之机，邱志国等人让国家付三百万块砖钱，实际上只交付二百五十万块砖，瓜分五十万块砖的虚额所得款。少数人和多数人在这两套账本编织的经济学道路上渐行渐远。因此，村里的老人——孙玉亭式的人物——对集体化时代恋恋不舍，部分孙少平式的年轻人则选择出走，寻找个人出路。

田留根婚姻问题历经波折，终于得到一个圆满结局。香果峪的杜淑媛为照顾相依为命的弟弟杜有志，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她没有沾染爱慕虚荣的不良风气，保持着善良本分的品行，接受了田留

根。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田留根的问题是以道德伦理的方式得以解决，并不具备普遍性。浩然没有止步于田留根个人的“小团圆”，他的立意在于从社会层面上，寻找一个整体性的改革方案。

老二保根看出了父兄追求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新时期理想是何等虚妄。他曾寄希望于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平凡的世界》里孙兰香的出路），失败之后立志与邱志国打一场持久战的官司，给田家庄来一次二度改革。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保根去田家庄之外寻找力量。他在小说中扮演着串联者的叙事功能，通过他的“流动”，把田家庄的地域性特征纳入更广阔的时代洪流中。他带着取经的心态，重述了红旗大队的改革方案。在老队长——一个从未出场的人物——的主导下，他们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劳动和分配制度，用自报公议的方法，把劳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重新编组，分为果树队、农田队、工业队和商业队。为了经济平衡，每个队承包金会抽出一部分补贴农田队。他们走的是一条超越于个体经营之上的农工商联合体道路。保根了解情况之后，直说“佩服！佩服！”

此外，还有一个极不起眼，被批评家忽略，但在浩然最初设计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杜有志。浩然是那种看重编辑意见的作家。1986年4月，浩然把《苍生》全部改了一遍，给编辑吴光华去信说：“除了没有删杜有志的文字之外，全都尽我力量遵照你和老谢同志意见改的。尽管杜有志这个人物‘理想化’一些，但缺少了他，就更显不出作者的‘倾向性’。为留点‘保险’的‘后手’，我还是保留了他。”^②但浩然的“倾向”没有坚持下来，后续书信中，他谈道，“因删去了花疯子和杜有志的故事，字数也比原稿减少”^③。从定稿本看，“花疯子”全无踪影，被彻底砍掉。而处理杜有志时，浩然显然手软了，留了条尾巴。结尾处，他与老二保根在田家见面，声气相投，说出了自己的抱负：“我打算将来把香果峪搞成养花木的专业村，我们有条件，有把握在这条道上让全队的人都过

上富日子。”

保根被评论家认为是“代表着未来希望的新生的人物,是新世界的觉醒者”^⑤，“是农村现实中最活跃的元素,预示着农村的未来和希望”^⑥。但他品质上糅合了太多的杂质,尖酸、刻薄、油滑……显然不是浩然期望的理想新人形象。他更多的是田家庄改革的内部否定,反倒是被设置为参照的红旗大队、杜有志清晰地表明了浩然的“倾向”。他们的社会理想脱胎于集体化时代,浩然以此为“保险”的“后手”,反映出作家彼时的思想状态。自然,浩然也受限于他的时代,但他由此对改革做出的观察,不论是否正确或推进到何种程度,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改革都不无裨益。

四、《苍生》的同时代性

可以想象,浩然的某些挪用自过去的观念,令很多当时的批评家难以接受。据说,评选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有人力挺《苍生》,浩然也志在必得。冯牧对此产生了警惕,特地找来《苍生》,花大精力细读和研究,然后在一个重要会议上慷慨陈词,狠批《苍生》,指出这是一个系统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全面歪曲和反对改革开放的作品,决不能获奖。^⑦所谓孤证不立,这则材料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苍生》确实曾经参选茅盾文学奖而落榜。与之对应,不受评论界青睐的《平凡的世界》荣膺茅奖,并成为此后数十年的畅销书,底层青年的阅读圣经。《平凡的世界》其实以孙家三兄妹为典型概括了当时农村青年的三条出路:孙少平通过个人奋斗追求劳动者的尊严;兰香通过高考改变人生命运;孙少安立足乡村成为农民企业家。只不过,在通常的阅读中,孙少平的故事压抑了兰香和孙少安的故事。随着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青年人成为孙少平的同盟军。在前途茫然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从孙少平那里汲取面对现实生活的精神力量,由此也构成了支撑起孙少平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与孙少平相比,兰香走的是一条轻松的捷

径。这类寒门贵子毕竟属于乡村中凤毛麟角的人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像是一个触摸不到的别人的故事,兰香也只有在刘震云的《塔铺》那里才能找到知音。但二人本质上追求的都是乡村青年的个人出路,只有被改革的潮汐推向历史舞台的孙少安,将个人的出路与乡村的出路重叠在一起。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孙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希望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引入机器、扩大生产规模——解决乡村中与改革伴生的问题。从原始的砖瓦窑到正规的砖瓦厂再到“双承包”,他个人的事业被纳入乡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中,同时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如此想来,孙少安才是那个肩负了更多历史分量的人物。孙少平成为阅读的焦点而孙少安的故事被压抑,其思想史的背景正是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个人主义思潮。在此情况下,孙少安涉及的如何重新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变成了一个被搁置的话题。

浩然未尝没有注意到农村青年的三条出路,但他却通过田留根的经历先后堵塞了兰香与孙少平式的出路,用所有力量集中回应孙少安式的问题。相对于路遥全景式地反映乡村改革,为青年人的人生提供不同的选择,浩然对于这一现象的反映无疑更具个人倾向性。或许正因此决定了这部作品难以承担茅奖的意识形态重任。但浩然在八十年代的意义也在这种“顽固”中凸显。他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之中,同时又在改革意识形态之外,带着一种“过时”的眼光,凝视这个变动的时代。

《苍生》定稿后,浩然曾与胡世宗有过一次精彩的谈话,系统地阐释了他的“苍生观”和“文学观”:

写《苍生》,别人写万元户,写专业户,甚至写什么观念在变化,也不能贬这个,各人有各人的写法、唱法。我不这么写。首先一点,我赞成改革。但目前这种改革是不是一剂良药?我在观察,改革就是前进。那么多人忧虑、困惑,正有你用武之地。我捡到枣了。无外乎少数人富裕起来了,忧虑的是多数

人什么时候富起来。这一个让我抓住了,一下子纲就抓住了。既反映现实生活,又能推动现实。有句诗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我反过来,“不问鬼神问苍生”。靠歪门邪道发财的是鬼,真正有本事发财的是神。这是鬼神。这我有可贬的,也有可褒的。我也能写。但更多的是苍生,鬼神毕竟是少数。没有门儿的,他们怎么办?这里面有血有肉。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折的时期,我抓住了这个。^②

对大多数人的忧虑、反映现实与推动现实的意图,映衬着浩然“写农民,为农民写”的创作信条。他是那种扎根在自己的生活根据地的作家。如同沁水县之于赵树理,冀东地区是浩然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也是他理解时代的起点。

新时期初期,文人空间轨迹的变动大体上是一个个“回城”故事,从农村到城市,从地方城市到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上海,浩然却反其道而行之,回到自己的生活根据地。1953年,浩然调至通县专区地委党校作教育干事。第二年调任《河北日报》驻通县记者站干事,行走于通县地区的大小村落,将其开辟为自己的生活根据地。《艳阳天》的主人公原型萧永顺即是浩然采写新闻时结识,并将友谊保持终生。于是,当浩然文坛受挫之际,他所想到的安顿之策就是回到乡下去。1980年浩然在京郊通县安家,1986年移居三河,直至去世。浩然的下乡固然部分牵涉工作上的人事因素,但客观事实是他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庙堂和文坛之外。毕星星谈到一次寻找浩然的经历:“一九八几年我到北京,想托朋友找他求教。他托人转过来一张字条,三行字:梁金广——通县县委党校——梁某某。朋友说他住的地方没有电话,要找我只有通过县委党校的梁某某联系,那是他一个本家。”他认为浩然是把自己封锁在乡下,对此颇有微词:“在城里得不到的真理,在乡下照样得不到。”^③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浩然的下乡不仅仅是做出一种抵抗的姿态,而是真诚地寻找自己的出路。八十年代以来,他绝大多数

时间都生活在县以下的镇子和村庄。改革中的农民和基层干部是家里的常客。他们向他吐露心怀,谈论得失,无保留地表达着对农村现状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决定写作了《苍生》时浩然的站位。

八十年代的浩然是不合时宜的,如同五十年代的赵树理。“进城”不久的赵树理产生了“脱离群众”的惶恐,先是频繁下乡,后来干脆离开北京,回到故乡任职。赵树理一直扮演着夹在农民和政府间的中间人角色,二者利益一致时,赵树理与上与下都是融洽的,发生矛盾时不免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在上书、会议发言这些文学之外的社会性文本,赵树理替农民说话。落实到创作中又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写问题小说,教育农民。^④赵树理身份的撕裂导致了最后的悲剧命运。赵树理之子赵二湖认为,“同样是写农村,他和马烽、浩然、柳青都不一样。首先赵树理认为他是个农业专家,不是科学上的,是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专家。他一直在想,以什么形式来搞农业生产,为什么他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有那么多看法想法,他一直在想,中国的农业以怎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最合理最能发挥效力。并且贫富之间,不要拉开太大的距离”。^⑤到了八十年代,那个与赵树理“不一样”的浩然变化了,开始扮演起赵树理在五十年代的角色,思考着彼时困扰着赵树理的问题。

只不过,从传统农村生活中走来的赵树理,关心的是集体化如何与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平衡。基于这个考量,赵树理在小农经济上更进一步,把自己的认同定位在初级社:“互助组、初级社,我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初级社时期一切都顺手……从高级社以后,我就钻不进去了。”^⑥而浩然是集体化时代的过来人和深度参与者,他关心的是如何平衡个体经营与社会主义理想。于是,浩然从人民公社后退一步,认同到个体经营之上的互助组、专业队的层面。

如此说来,八十年代的浩然与五十年代的赵树

理便是殊途同归,一体两面。他们都成了各自时代中在现场的乡土小说家,是那种“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⑧,于是也便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这是阿甘本提出的“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事物同属一个时代”的问题。他同时认为,真正的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译者把人体内感知黑暗的物质翻译为“制性细胞”,陶东风则有一个直白的解释:批判性思维。^⑨从《苍生》与时代的关系来看,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浩然是具有这种批判性的。

这种批判性思维使浩然与当时的作家拉开了距离。刘绍棠曾将自己与浩然做过对比:“我虽然在文化水平上比浩然高一点,但是浩然在生活阅历上比我丰富深刻得多。我比浩然有灵气,喜欢逞强斗胜;浩然实干,以韧性求发展。表现在我们的小说创作中,我爱写多情重义的女子和粗犷豪放的汉子,浩然则擅长刻画安分守己、吃苦耐劳的农民”,“《苍生》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便是浩然独具匠心,为我所不及”。^⑩如果我们不安于简单地把“不及”当成作家的自谦,执意要深挖下去的话,我想,其根本原因便是这种同时代性。

结语:新见史料、历史情境与“八十年代浩然”

浩然对《苍生》寄予厚望,出版以后十分注意外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他曾于1987年6月13日致信吴光华:“新华社对《苍生》发表,或讨论事,发了通稿。只知天津的《今晚报》和《河北日报》《建设日报》用了,还未见到。此事倒能看出各地、各角落的‘态度’,值得留神……《文艺报》的专访发表后,请打电话给熟人,寄两张报纸给我。”作家的热切和现时的冷遇,不免令人感叹文学史的残酷。但是随着近年来浩然史料的浮出,围绕着作家作品的历史情境得

以向我们敞开,这就为重新理解《苍生》,重新理解浩然甚至于重新理解八十年代打下了基础。

家属是提供当代已故作家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源头。浩然子女在父亲去世后,一直从事搜集、整理浩然材料的工作。梁秋川近年来出版有《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和《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前者是从子女的视角对父亲形象的重塑,后者则为我们勾勒了浩然的交友和为人,两本书都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细节,其意义有待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掘。

尤为重要是浩然子女編集完成但尚未问世的《浩然书信集》,该书收录了浩然自1957年至2002年期间的一千余封书信,对浩然不同时期文学活动、思想状态和生活情况的一份历史记录。具体到本文讨论的《苍生》而言,浩然与编辑吴光华的系列通信,基本还原了小说创作、修改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作家构思到定稿的创作线索。1987年2月14日关于《苍生》定稿本的通信是一份重要研究材料。浩然信中说,把稿子交给吴光华“全权”处理,但是只有一个要求:抓紧发稿,千万不可再拖延了。他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单行本的意见,随信单独附上。

关于《苍生》书稿的几件事

一、因杂志迟迟不出来,我急于下乡和趁不冷不热的季节写另一部长篇,原来“听听意见再整理书稿”的打算只能让它落空。此书稿是在清样的基础上整理的。

二、为不增加字数,前二十八段,除更改个别文字,基本未动。

三、二十九段恢复3,500字,即田大妈与杜淑媛第一次会面情节。我觉得这情节对这两个形象和故事延续,都有作用。

四、三十一节恢复2,000字,即田留根被“逼”萌生做贼的“一条线路”式的细节,它是人物性格“反动作”的一个根据,缺了不好。

五、恢复了“第二次手表事件”。我总觉得有此事件,才能够给旧观念和旧习俗以沉重打击,从而鲜明和加深了主题思想。因删去了花疯子和杜有志的故事,字数也比原稿减少:连同最后两段里与之有呼应的细节恢复,共计增加四万字(40,000)。希望编辑部能同意我的要求。

六、二月中旬交稿,我希望一九八七年内能够出书。

七、由于这是我的一部重要著作,希望加个“小传”,或名“作者介绍”,附于生活照的后面。草拟一稿,连同照片随书稿一齐奉上。这幅照片我只有—张,请保存好。

八、封面问题,我喜欢庄重、大方、有气魄的。以图案形为宜。“苍生”二字越大越妙;用美术体或书写体;放在封面上端,占三分之一以上篇幅也无妨。

九、希望早日确定插图画家,请其早动手创作。最好肖像式的,不一定画全景式的。封面和图我都想看看样稿。

十、书稿请编辑部加工,我只等看校样了。

十一、以上属于汇报和建议,请指正、供参考。

浩然对《苍生》的重视、浩然与编辑的交往方式、书稿的修订信息以及浩然的趣味等,从这里都可以得到展现。

新近出现的史料还有浩然挚友胡世宗的《我与浩然》(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胡世宗把平生大部分与浩然相关的日记选载到本书中,并收录往来书信一百余封。1975年,借调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胡世宗因工作关系与浩然相识。从当年3月6日起,与浩然交往的点滴都被胡世宗记录在日记里,从生活到创作,展现了一个全面立体的作家形象。二人在八十年代中前期接触紧密,鸿雁频传,日记、书信这类私密性史料的出现,极大地填补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浩然处境和心境理解上的空白。

常熟图书馆主办的《读书台》杂志在2018年以1—4期合刊的形式,推出浩然专刊。其中,梁春水、梁秋川编辑的《浩然书目》是对浩然著作的搜集和整理,长篇小说附有详细的版本信息,文集、选集、全集附有具体篇目。在这些基本内容之外,还收录了获奖作品信息,以及由作品改编的连环画、影视剧、话剧、戏曲等内容,全景式地展现了浩然创作面貌。梁秋川、刘国震编撰的《浩然著作叙录》按照文学体裁分目,对每本著作附有书影、出版社、印刷单位、发行单位、出版时间、印刷时间,开本、印数、书号、定价、责任编辑、装帧设计、插图、尾花、序言、后记情况、目录和正文页数,收入作品篇名、内容简介,以及再版和重印情况等,事无巨细,一一载入,是一份难得的基础性资料。再如闻一的《南师与浩然》、赵长青的《孙犁与浩然》等文章,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关于浩然的侧面信息。

目前研究浩然的阐释框架,大体上可以分为政治的、审美的与民间的三种方式。这三个框架又都建立在“十七年浩然”“文革浩然”之上。我们对此感到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原因,除了受限于个人的知识范式之外,还苦于缺少史料支撑。近年来的新见史料有的直接与作家创作相关,有的集中在作家作品的周边,有的则是整个浩然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弥补了研究中的这一遗憾。本文的立意就是以这些新见史料为基础,进入浩然创作《苍生》的历史情境,触摸一个与“十七年浩然”“文革浩然”不一样的“八十年代浩然”。

“八十年代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熟悉的陌生人。在“浩然”这个问题域内,它是“十七年浩然”和“文革浩然”的自然延续和转化,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可以重新激活这两个已经被标签化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胀破已有的阐释框架。在“八十年代”这个问题域内,它又可以以其同时性,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一个支点和跳板。

汉学家卜正民在谈论他的明史研究时讲,历史研究就像是在疾驰的火车上看窗外的风景,沿途的景物似乎在快速改变,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经过而变得不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我们在车轨上的位置及其相应的视角。研究者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所提供的视角出发,告诉读者所见到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的师长错过了我们观察到的历史风景,而是他们站在跟我们相异的火车轨道拐弯处,看到了与我们所见不同的历史。^⑤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有四十年的历史,浩然逝世也过去了十年,我们与师长——他们曾在历史当事人的位置上刻画了通行于今天的作家肖像——相比,已经来到了火车轨道的新位置上。如何记录我们所看到的窗外风景,或许正是我们这些后来人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⑤⑦⑧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苍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苍生》问世后,较为重要的评论有曾镇南的《在蜕变的途中》(《长篇小说》1987年第16期)、顾骧的《不问鬼神问苍生——读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文论报》1987年第21期)、雷达的《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反观浩然的创作道路》(《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杨长春的《从〈苍生〉看浩然的矛盾心态》(《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1期)、刘白羽的《大地的心声——读〈苍生〉》(《人民日报》1991年6月13日)。小说曾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文学优秀作品奖。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到的《苍生》专题论文仅有以下三篇:叶君《遮蔽与敞开——关于〈金光大道〉和〈苍生〉的对比阅读》(《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云雷的《〈苍生〉与当代中国农村叙事的转折》(《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和徐勇《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与欲望问题——从浩然的〈艳阳天〉到〈苍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3期)。

③孙达佑:《浩然创作心态》,《北京文学》1991年第9期。

④浩然1983年3月14日致胡世宗信。见胡世宗:《我与浩然》,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01页。

⑥浩然1986年3月8日致刘国玺信。浩然去世之后,浩然子女梁春水、梁秋川曾搜集整理出父亲自1957年至2002年的信件一千余封,编集为《浩然书信集》。本文所引信件源自梁秋川先生提供的未刊本,特此致谢。

⑧⑨雷达:《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反观浩然的创作道路》,《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⑩杨长春:《从〈苍生〉看浩然的矛盾心态》,《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1期。

⑪⑫⑬胡世宗:《我与浩然》,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177页,第63页,第123页,第191页。

⑭⑮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页,第296页。

⑯⑰⑱浩然:《苍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第49页,第62页,第41页。

⑲⑳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第49页。

㉑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上,生产资料归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规模不同的集体所有,其中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

㉒浩然1986年4月11日致吴光华信。

㉓浩然1987年2月14日致吴光华信。

㉔刘白羽:《大地的心声——读〈苍生〉》,《人民日报》1991年6月13日。

㉕伯牛:《记忆浩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㉖毕星星:《毁誉参半说浩然》,《星星诗刊》2008年第5期。

㉗赵勇:《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㉘⑳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第118页。

㉙⑳吉奥乔·阿甘本著,黄晓武译:《何谓同时代人》,《裸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㉚陶东风:《启蒙、批判与同时代——对三个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㉛刘绍棠:《文学个性与人的个性相关——我与浩然》,《我是刘绍棠》,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

㉜⑳加卜正民著、方骏等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文新版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